

元好問
論詩三首

集說
十首

劉澤

山西人民出版社

刘泽

元好问
论诗三十首
集说

山西人民出版社

晋新登字 6 号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集说

刘 泽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625 字数：290千字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太原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203-01973-x

F·285 定价：8.90元

说 明

一、本书旨在提供一本研究遗山诗学的参考书，汇集了笔者所见到的当代与古代、海内与海外诸家对《论诗三十首》的注释和评论，并选注了三十首之外的元氏论诗的诗文。

二、本书以《论诗三十首》的“集说”部分为主。“集说”以一首诗为单位，分“集笺”、“集评”和“按”三个部分。“集笺”一般以一句诗为单位，“集评”以一首诗为单位。“按”在“集笺”、“集评”之后都有，主要是简要地释评原诗，对诸家之说，一般不作评断。

三、本书以遗山其他论诗的诗文为副。对这些诗文作了简注。诗文是据清朝光绪七年忻州读书山房刻本《元遗山先生集》而录，诗按体式排列，文按编年排列。

四、诸家释评的整理选择、编排次第，一般以内容逻辑为重，较少考虑所用书文的出版先后。

五、诸家释评中的引录若有重复，后见者多以省略号代之；如引录的文字同中有异，则一并录出。注释和评语若有交错现象，则视具体情况而定，或录于“集笺”，或录于“集评”。注释若有关合前后诗句者，只于一处录之。

六、诸家释评，一律以原来的文字、标点为准，不作辨正。无标点的古籍，加以标点。

七、本书前面列有主要引用书文的篇目，凡书皆注明著者姓

名、版本，其中有的书名后标有简称，在征引时使用简称；凡文皆注明作者姓名及其发表的刊物名称、年月、卷期。本书后面附有主要参考书文，书只标明作者姓名，文与引用文章同。另外，还附了笔者的有关论文四篇。

八、本书留意于海内外特别是海峡两岸学术的交流，凡作者系台港和外籍人士，书刊系台港和外国出版的，均一一标明。

序

姚奠中

1985年9月和1990年8月，在山西忻州元好问的故乡召开了两次“元好问学术研讨会”。头一次会后，筹备了“元好问研究会”；第二次会后，成立了“元好问学会”。这两次会，都是为了纪念元好问诞辰而召开的。头一次是七百九十五诞辰，第二次是八百诞辰。在头一次会后的五年中间，以刘泽同志为首的“元好问研究会”，开展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重大成绩。首先是组织了研究队伍：通过创办《元好问研究信息》，得到广泛的响应。通讯联系和要求参加“研究会”的，遍及包括台湾在内的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还远及日本、美国。其二是研究范围迅速扩大：从诗、词、文、史以及学术思想、哲学思想、史学思想和对生平事迹的考证、论辨等各个方面，全都展开了。到去年第二次研讨会时，其论文、论著之多，成果之丰硕，为其他学会所少有。而这些，和刘泽同志坚持不懈的努力推动分不开。与此同时，刘泽同志在忙于会务之外，仍能致力于个人研究。即在去年会后短短的几个月中，又编辑成《元好问诗词文析论》，《元好问论诗绝句研究》，《元好问生平思想探微》，《台湾学

者元好问研究论文选》等四个集子；同时他自己又辑著了这本《元好问论诗三十首集说》。

关于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的价值及其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已久为学术界所公认。不烦多赘。我这里想提出的，则是和司空图作一对比。司空图和元好问，一在晋南，一在晋北，一在唐末，一在金末；时、地各不相同。但都是诗人，都在论诗，而且都使用了韵语和形象化的艺术形式，又颇相似。在成就方面，司空重在诗歌理论，属于艺术论，是理论家；而元氏重在评诗人和诗作，属于作家论，是评论家。他们这两种作品，在历史上以至当前国内外学术界，都有相当大的影响，一直有不少人在研究。但由于他二人所处具体时代、具体处境的不同，因之在人生态度和文化史学上的地位，司空就远不能和元氏相比了。一般认为司空《诗品》玄妙、抽象、难懂；而元氏《论诗绝句》则实在、具体、易读。但前者可以由读者通过主观去体会、去体味，去“以意逆志”；而后者则非勾稽、考据、参订、论证不为功。所以对元好问《论诗绝句》的钻研，重点在此而不在彼。

八十年代以来，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有很大发展。新观点、新方法，多角度、多层次，使研究工作，步步深入而广泛，也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但这些成绩，多分散于各类报章、杂志、总集、专著之中，学习者，难于遍睹；研究者，难于搜求。新成果不得利用；旧问题重复摸索。劳而少功，费而少效。于此，汇集有关资料，作综合性、总结性的专人、专书、专题研讨，就是十分必要的了。刘泽同志编辑的前边谈到的那四部集子，都是这方面的重要工作，而《论诗三十首集说》，则是他自己进行的总结性的专题研究成果。

作者自述这本《论诗三十首集说》的特点是：“汇集了当代与古代，海内与海外诸家对《论诗三十首》的注释和评论，还选注了三十首之外的论诗的诗、文”；全书“以‘集说’为主。

‘集说’以一首诗为单位，分‘集笺’、‘集评’、‘按’三个部分。‘集笺’一般以一句诗为单位；‘集评’以一首诗为单位。‘按’在‘集笺’、‘集评’之后都有。”（引自本书“说明”）作者仅在本书开始的“题解”中，就备引了古今各家对《论诗三十首》的评价和写作年代的考证，约四千字，后加“按”语两千多字，充分体现了总结性的研究精神。这样的作法，既给读者研究者提供了比较完备的资料，又提供了个人钻研的结论。其作用，可以不言而喻。

刘泽同志是六十年代初山西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他在三十多年的学习和工作的进程中，是相当坎坷的。但他从来没有消沉过，他总是积极勤奋，自强不息。工作上每遇一事，不抓则已，要抓就千方百计抓到底，一定要抓出成果，抓到胜利；工作如此，学问上也如此，值得强调的是他不止是为个人出成果，而是常考虑把别人的成果，汇而集之，表而出之，使之发挥集中有力的作用。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现在，社会上一般知识阶层中，除过庸庸碌碌，不求上进或醉心贪婪享受，追权逐势者外，有一些学有基础，才思敏捷，文章清顺，遇事明决的中青年，本当大有作为，但其中有的好高骛远，不屑于作扎实的一步步前进的工作，而企图一举成名；有的见异思迁，时常有头无尾，常期望得到一个更比一个好的机遇；有的过多地追求名利，甚至不惜弄虚作假，哗众取宠；当然还有……。这是令人十分惋惜的。因此，我认为很需要既高瞻远瞩又踏踏实实，象刘泽这样的同志。那我们的事业，就会搞得更好。在“元好问学会”正在健康发展的时刻，在下

次元好问学术研讨会将在开封召开已开始准备的情况下，刘泽同志这本书，将以新的研究成果的面目，呈现于与会同志之前以及广大读者之前。

以上仅就对刘泽同志的工作与研究的一些看法和自己的一些感想，拉杂写出，权充作本书一篇简短而粗浅的序言吧。

1991.5.

主要引用书文

元遗山诗集笺注（简称《笺注》） 清·施国祁 清道光二年
南浔瑞松堂蒋氏本

初白庵诗评 清·查慎行 四部丛刊本

石洲诗话 清·翁方纲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古今论诗绝句 清·宗廷辅 据郭绍虞《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
笺》

元遗山论诗三十首笺释（简称《笺释》） 王韶生 香港《崇基
学报》1955年第5卷第2期

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笺证（简称《笺证》） 何三本 台湾
《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963年第7卷第3、4、5、6期

元遗山论诗绝句讲疏（上篇）（简称《讲疏》） 陈湛铨
《香港浸会学院学报》1968年第3卷第1期

元遗山研究 续琨 台湾中华书局1974年版

诗人元遗山研究 李冠礼 台湾正中书局1975年版

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简称《小笺》）
郭绍虞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 郑绍虞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版

谈艺录（补订本） 钱锺书 中华书局1984年版

元好问和他的诗 林从龙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论诗绝句二十种辑注 吴世常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元好问诗选 陈祉斋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历代诗话(丛书) 清·何文焕 中华书局1981年版

历代诗话续编 丁福保 中华书局1983年版

元遗山论诗的特识 吴天任 台湾《民主评论》1956年第7卷第17期

元好问论诗绝句析论 [新加坡]皮述民 新加坡《南洋大学学报》1958年第3期

评元好问论诗绝句一首 叶庆炳 台湾《纯文学》1960年第10卷第1期

略论元好问的诗论 吴庚舜 《光明日报》1964年7月19日《文学遗产》第470期

论元遗山论诗绝句三首 陈惠丰 台湾《中外文学》1967年第7卷第1期

元遗山论诗绝句析评 田凤台 台湾《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968年第12卷第4期

元好问诗论 刘禹昌 《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第5期

元好问论诗初探 李正民 《西南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

评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 陈书龙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

从元遗山论诗绝句谈谢灵运与柳宗元的诗与人 加拿大·叶嘉莹《中国古典诗歌评论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二解 陈长义 《文艺理论研究》1984年第2期

李商隐无题诗构思特点 周先民 《文学评论》1984年第2期

法贵天真 诗家坦途——元好问诗学理想及渊源论略 李 蹊

《晋东南师专学报》1985年第8期

“曹刘”是指谁——元好问《论诗绝句》商榷 黄瑞云 《语文月刊》1986年第1期

元遗山和范宽的《秦川图》——为元遗山《论诗三十首》之一索解 卢兴基 《文学遗产》1986年第2期

试论元遗山《论诗绝句》第十五首 邓昭祺 《文学遗产》1986年第2期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辨释 蔡厚示 《光明日报》1986年8月26日《文学遗产》第713期

元遗山诗论的传统性与创造性 卢兴基 《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4期

论元遗山的《论诗三十首》 何林天 《山西师大学报》1987年第4期

《自题中州集后》五首释评 陈长义 《四川教育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

理论与艺术联姻的佳作——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之四赏析 卢永璘 《文史知识》1988年第1期

《答俊书记学诗》钱说献疑 程亚林 《武汉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

元好问《论诗绝句》非青年之作 周本淳 《江海学刊》1989年第4期

《论诗绝句》九首献疑 周振甫 《纪念元好问八百诞辰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通论

刘 泽

《论诗三十首》是金代诗人、文艺批评家元好问的早期诗学代表作，写于28虚岁。因其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杜甫《戏为六绝句》中提出的“别裁伪体亲风雅”和“转益多师”的精神意蕴以及七绝论诗的样式，为我国诗坛确立了品评诗人诗作的批评流派，为恢复、弘扬诗歌创作的风雅传统，为金代诗歌开辟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做出了可贵的贡献，泽及后世，影响较大，因而名重士林，历代多有赞评。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著和古代文论选本，无不评介，近年来海内外还出版了许多研究《三十首》的专著专篇，成为元好问研究中的一个热点。统观这些论著，在解释字句涵义、阐发诗论体系的本体诠释方面不乏灼见，对理解原著有所启示，然大都忽略了《三十首》写作的现实契机、心理背景，无视它的批评方法，也未顾及元氏中晚期诗学观的发展变化，故往往是各照隅隙，不够全面。本文拟就元好问的写作契机、论诗标准、批评方法等问题，谈点粗浅看法，或可有助于进一步全面理解《三十首》的内涵。

一 写作契机

论诗诗这朵诗坛新葩，出现在唐代，为人熟知的有李白《古风》第一首（“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杜甫的《戏为六绝句》、韩愈的《调张籍》等。就形式言，有单章、组诗之别，五古、七绝之异，尚未定型；就内容言，有形象的评人评诗、论史论理、抒发抱负，现实性很强，无一不是拨乱反正，重振风雅，有待承传。到了北宋，又出现了以文谈诗的诗话新样式和以议论为诗的创作之风，说理之“论”加强了，“诗”的形象性减弱了。在全唐半宋的诗歌批评面前，似乎有一个历史任务要求诗家或诗论家承担，那就是选择什么样的诗体来论说诗作诗理，既有“论”的体系，又不失“诗”的形象美。于是，在同一历史时期，南宋出现了江湖诗派代表作家戴复古的《论诗十绝》，北方的金朝出现了王若虚的《论诗诗》（或题《评东坡山谷四绝》、《评王子端四绝》）和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他们不谋而同，都用七绝论诗，这一偶合的现象，可能寓有历史的必然选择。只是在“程学盛南苏学北”的文化总势中，戴复古偏重阐述诗理，缺乏诗的形象特征，尚“理”而乏“象”；王若虚局限于评论个别大家，范围很小；只有元好问的《三十首》“论”与“诗”并重，寓理于具体的意象之中，而且篇幅宏伟、结构严整、立论较高、评述系统，成为艺术与逻辑联姻所产的新婴，开辟了诗歌批评领域的新版图，于是博得后世诗人、批评家、学者的青睐，奉为论诗诗的正宗，递相祖述，多有仿效，形成诗歌理论界的一支异军。在清代，王士禛有《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五首》，袁枚有《仿元遗山论诗三十八首》；在当代，郭绍虞有

《题〈宋诗话考〉效遗山体二十首》。没有明题仿效的论诗、论词绝句就更多了。就《三十首》的仿效者之多，影响之大，应该说它是七绝论诗诗这一传统确立的标志。

《三十首》上承杜甫《戏为六绝句》，下启评论诗人诗作一派，确立了七绝论诗的批评形式，在诗歌批评史上占有一席重要位置。它的出现的时间，作者题下的自注是“丁丑岁三乡作”，即金室贞祐南渡后的第四个年头兴定元年，公元1217年。那么，贞祐南渡前后金代的国情、文情、诗坛的创作和批评的实情、作者的处境和心情等是怎样的呢？

从文献得知，金代的国政文风，在章宗朝的明昌、承安之后有一个较大的转折，或者说质的变化。《大金国志》说：“章宗性好儒术，即位数年后，兴建太学，儒风盛行。学士院选五六人充院官，谈经论道，吟哦自适。群臣中有诗文稍工者，必籍姓名，擢居要地，庶几文物彬彬矣。惜其十年以后（指明昌、承安之后），极意声色之娱，内外嗷嗷，机事俱废，间出视朝，不过顷暂，回宫与郑宸妃、李才人、穆昭仪并马游后苑，因留宴，俟月上，奏鼓吹而归，以是为常。”《金史·赵秉文传》亦说：

“金自泰和、大安以来，科举之文，其弊益甚。盖有司惟守格法，所取之文卑陋陈腐，苟合程度而已。稍涉奇峭，即遭絀落，于是文风大衰。”可见在章宗朝的泰和（1201—1208）、卫绍王的大安（1209—1212）以至宣宗贞祐（1213—1216）年间，由于朝廷上下生活的淫狠侈靡，政治、科考上的腐败，文化上的儒风大衰，致使前期文人学士“谈经论道，吟哦自适”的刚柔相济、文质彬彬之风日息，早在明昌、承安间（1190—1200）出现的“尖新”“浮艳”之风日炽（参看刘祁《归潜志》卷八），在这样的政教文化大气候中，金诗便向重文轻质的浑泥浊水流

去。

正在此时，崛起漠北的成吉思汗自将铁骑骎骎南下，大安三年（1211）踏破长城，节节胜利，贞祐二年（1214）宣宗被迫自中都（北京）南迁汴京（开封），翌年中都陷落，自此中原板荡，生灵涂炭，金国势衰。成吉思汗的入侵，社会现实的巨变，要求诗人们以激昂慷慨之音振作民气国气，于是“南渡后文风一变，文多学奇古，诗多学风雅，由赵闲闲，李屏山倡之。”（刘祁《归潜志》卷八）时代的急剧变化，将金诗从尖新、浮艳的滑坡邪路上拉向质朴典实的风雅正道。

文坛首领赵秉文、李屏山虽然共倡风雅，以意为重，要求反映现实，抒发心声，讽谕时政，然而情况相当复杂，元好问在《中州集》卷十“溪南诗老辛愿小传”中对当时诗坛的创作、批评状况作了这样的记载：

南渡以来，诗学为盛。后生辈一弄笔墨，岸然以风雅自名，高自标置，转相贩卖，少遭指撻，终死为敌。一时主文盟者，又皆泛爱多可，坐受愚弄，不为裁抑，且以激昂张大之语从臾之。至比为曹、刘、沈、谢者，肩摩而踵接，李、杜而下不论也。

后生辈的创作是假风雅之名而无风雅之实，不顾社会效益，如果有人指责一句，一辈子怀恨在心。主文盟者的批评是泛爱多可，无原则地赞许。无论创作和批评，迷雾濛濛，雅道未明。尤其是批评界的文雄健将，观点相左，持议相争，甚至相互诋讥漫骂，亟需整合众议，建树公允之论，平息门户之见。

我们知道，金诗本承北宋遗绪，深受苏黄以及江西诗派的影响，苏黄虽都追求新变，然诗风诗论迥异，江西诗派宗主黄庭坚而不取法苏轼，就是明证，因此，如何对待苏黄及江西诗派，

就成为当时诗界争议的焦点。开始是赵秉文与李屏山对峙，继之有王若虚与雷希颜相讥。从赵李王雷言行态度的总倾向看，赵王相近，李雷同属，两派基本上都秉承周昂的“文以意为主”而立论，都对江西诗派的末流有所贬斥，主要分歧表现在宗苏宗黄上。赵秉文推崇苏轼，在《答李天英书》中论及前代大家时说：“太白词胜于理，乐天理胜于词。东坡又以太白之豪、乐天之理合而为一，足以高视古人，然亦不能废古人。”而不提黄庭坚一语，却讥讽李天英受李屏山影响，诗尚奇怪，专学李贺、卢仝，“未能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凤鸣不可得闻，时有枭音耳。”李屏山则推崇黄庭坚，在《西岩集序》中说：“黄鲁直天资峭拔，摆出翰墨畦迳，以俗为雅，以故为新，不犯正位，如参禅著末后句为具眼。江西诸君子翕然推重，别为一派。”（见《中州集》卷二“刘西岩小传”引）刘祁《归潜志》卷八载，李屏山评论赵秉文是“才甚高，气象甚雄，然不免有失支堕节处，盖学东坡而不成者。”为《闲闲集》作的序中，还阴讥暗讽道：“公诗往往有李太白、白乐天语，某辄能识之”，“公谓男子不食人唾，后当与之纯、天英作真文字”。赵秉文反唇相讥说：“文字无太硬，之纯文字最硬，可伤！”“之纯文字止一体，诗只一句去也”。赵李之争发展到王若虚和雷希颜，更为激烈，王若虚在《滹南诗话》卷二中竭力尊苏贬黄：“东坡，文中龙也，理妙万物，气吞九州，纵横奔放，若游戏然，莫可测其端倪。鲁直区区持斤斧准绳之说，随其后而与之争，至谓未知句法；东坡而未知句法，世岂复有诗人。”“山谷之诗，有奇而无妙，有斩绝而无横放，铺张学问以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而浑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此所以力追东坡而不及欤！”卷三又说：“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特剿